

中国坚定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 刘发为

“中国不懈努力，众多消失或濒危的野生物种重新获得了生命的自信和尊严。”伴着旁白，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简称“COP15”）中国宣传片的画面，帧帧美丽，扑面而来，可爱的生灵讲述着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

目前，COP15第二阶段会议正在召开，今年恰逢《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30周年，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该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持续采取多种举措，坚定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局面不断向好，解决了许多“老大难”问题

在中国大地上，处处洋溢着生物多样性之美——云南野象自由“旅行”，“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频亮相，云猫重现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青藏高原再现藏羚羊“万羊齐奔”的壮丽景象……

如今，中国陆地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占陆地面积的30%以上，覆盖了所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和生物多样性分布关键区，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了有效保护。

生态环境部自2017年起持续开展“绿盾”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侵占和破坏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持续督促问题整改和生态修复。截至2021年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完成率达94.7%，其中，17个省份的整改完成率高于95%。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表示：“‘绿盾’专项行动集中解决了一批‘老大难’问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增人类活动问题总数和面积实现了明显‘双下降’，基本扭转了侵占破坏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趋势。”

截至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建立了749个观测样区，完成了对全国高等植物、脊椎动物和大型真菌濒危状况评估。



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一直在行动

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2011年，中国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指导“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发布并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及22个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近10年来，中国颁布和修订森林法、草原法等20多部相关法律法规。2021年，中国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全面总结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举措和成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若干意见》，成为全面推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2021年10月，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举办。“过去一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迈出了新的步伐。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北京、广州国家植物园挂牌并向公众开放，开启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崔书红表示。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报告显示，2013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涉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审案件18.2万件，涉及中华鲟、藏羚羊、红豆杉等中国典型、独有野生物种和穿山甲、噬人鲨、珊瑚等全球珍稀、濒危物种，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道路。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在坚定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近年来，中国与许多国家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中国、老挝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面积已经达到了20万公顷，有效保护了亚洲象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已经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领域培养了200余名来自非洲的研究生，为非洲国家建

立起本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人才队伍……

在对外投资合作中，“中国政府始终鼓励和引导企业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环境部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实施了《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对项目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崔书红表示。

肯尼亚的蒙内铁路，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全线均设置了大型动物通道、桥梁路和涵洞，以保障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在加纳集装箱码头工程项目建设期间，还专门建立了“海龟孕育中心”，放生小海龟。这些项目既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又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环顾世界，每年约1/3的温室气体排放被自然生态系统吸收，一半以上的GDP总量依赖自然资源的贡献，超过30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的生物多样性。这些都在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福祉。

上图：江苏昆山通过保护并提升生物多样性等措施，提升水廊两岸的生态质量，让居民亲水而居。
袁新宇摄（人民日报）

树干挺拔，树冠如盖，枝条顶部一朵单生的花，初开时外轮的红色花瓣外深内浅，盛放时露出内里两轮白色花瓣——今年4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的一株华盖木开花了。

这并非昆明植物园首次迎来华盖木花朵的盛开。但作为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华盖木从引种至园内到首次开花，经历了30年的漫长等待。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家刘玉壶带队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野外考察时，无意中发现一株高约40米、树冠形状奇特的高大乔木，遂命名为“华盖木”。这一我国特有的木兰科单属植物，最初在野外仅发现6株，已不能维持物种的正常基因交流与繁衍。

为抢救性保护华盖木，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自2001年起，带领开展10多年的野外调查，迄今为止共发现52株野生华盖木。在孙卫邦团队的推动下，它们都得到了有效的就地保护。然而，华盖木由于野外生境片段化、传粉效率低、种子不易萌发等问题，种群自然更新困难。要想保留并复壮这一物种，必须通过迁地保护，利用科技手段加以照护繁育。1983年起，昆明植物园开始引种栽培和迁地保护华盖木，如今园内77株不同年龄段的华盖木，均来自对野外植株种子的人工繁育。

孙卫邦介绍，为保留人工引种华盖木的基因多样性，园内的华盖木绝大多数都不是同一株树的后代。这种尽可能采集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植株种质资源的做法，保存了华盖木70%左右的遗传多样性。

经过多年的科学养护，2013年3月，昆明植物园最早引种的一株华盖木终于露出花颜。这意味着华盖木迁地保护取得了成效。在盼望花开的许多年里，华盖木种质资源保存技术、组织培养快繁技术、野外移栽方法等科研项目也取得突破。如今，已有超过1.5万株华盖木回归自然，迎来新生。

华盖木的幸运不是个例。《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指出，中国针对包括华盖木、德保苏铁、百山祖冷杉在内的1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开展抢救性保护，112种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实现野外回归。

华盖木重获新生的关键，在于迁地保护。“迁地保护最大的好处，在于方便开展有性繁殖等科学研究。”孙卫邦表示，常年开展的科学管护、生长动态监测等工作，不仅

亭亭如盖 绿满中国

本报记者 朱金宜

让华盖木种群摆脱濒危困境，也为其他珍稀野生植物的栽培保育等工作提供了经验指导。

植物园是迁地保护的重要场所。202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本着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今年4月和7月，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相继正式揭牌，“植物迁地保护”成为南北两座国家植物园的重点工作与核心功能。

目前，国家植物园共收集、保存植物1.7万余种（含种以下单元），已迁地保护植物1.5万余种，其中迁地保护水杉、珙桐等珍稀濒危植物近千种。不少人通过网络直播，观测到世界首次迁地保护的巨魔芋在人工栽培状态下集体开花。这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红色物种的神奇植物，如今在国家植物园里生机勃勃、生生不息。

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逐步实现我国85%以上野生本土植物、全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得到迁地保护的目标，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形成有机衔接、相互补充，有效实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全覆盖和可持续利用。

朱鹮再度飞舞

本报记者 朱金宜

长喙、凤冠、红首、白羽——美丽优雅的朱鹮并不“高傲”，而是习惯飞入农田低头觅食，与正在劳作的农人相依相伴。这般场景，如今在陕西省洋县不时可见，但在从前无异于天方夜谭。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20世纪，曾在东亚地区广泛分布的朱鹮由于栖息环境遭到破坏，种群数量急剧减少，濒危的警钟不断敲响：60年代，俄罗斯远东地区朱鹮灭绝；70年代，朝鲜半岛最后一只朱鹮消失；80年代，日本捕获境内最后几只野生朱鹮，实施人工饲养，却未能见到后代的身影……野生朱鹮是否仍有一线生机？世界将目光投向中国。

“找了3年，行程5万多公里，走遍全国十几个省份、260多个朱鹮历史分布点，才在这里发现当时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今年86岁的刘荫增，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鸟类专家。1981年，他和团队的寻鹮之



左图：两只朱鹮在陕西省洋县谢村镇一片收割后的稻田里嬉戏。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旅，终于在陕西省洋县的姚家沟村抵达终点。

为了守住这7只“宝贝疙瘩”，刘荫增等人在朱鹮筑巢的树下驻扎，成立“秦岭一号朱鹮群临时保护站”，24小时监护朱鹮的一举一动。“爬田埂，蹲巢区，朱鹮飞到哪儿，我们就跟着跟到哪儿。”时任洋县林业局干部的路宝忠记得，为了不让朱鹮离开视线，大伙经常跑得满头大汗，却也乐在其中。

“贴身”护鹮尽管初显成效，但并未让朱鹮摆脱极小种群的灭绝风险。想尽快扩大朱鹮种群，野外保护和人工繁育“两条腿”都要“跑起来”。于是，洋县一边改进野外保护措施，发动更多群众参与朱鹮监测与巡护工作；一边加强科研攻关力量，探索朱鹮饲养繁育技术和种群管理新方法。合力之下，朱鹮数量低位徘徊的瓶颈终于被打破。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等项目

有效修复秦岭地区森林、湿地生态系统，建立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升保护管理能力，朱鹮种群进入加速复壮阶段，人工种群和野化放归种群不断建立。2012年，朱鹮种群数量突破1000只；十年后的今天，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扩展至9000余只。

日渐庞大的朱鹮家庭，总有“旅行者”飞出秦岭、回到祖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从洋县一隅到安康、商洛等更广阔的秦巴地区，不少朱鹮自然扩散；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人为扩散、野化放归的朱鹮正“自在生活”；从陕西到河南、浙江、江苏等地，朱鹮易地保护愈加成功；在日本和韩国，中国专家帮助重建的朱鹮人工种群已实现野化放归和野外繁殖……

40多年来，中国建立起“就地保护为主、易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鹮和谐共生”的朱鹮保护模式，朱鹮保护拯救工作实现了从抢救性、无差别个体保护向改善和扩大栖息地、增大野外种群的历史性转变。

如今，朱鹮这一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旗舰物种，不仅自身脱险，还伞护了秦岭等地的其他野生动物种群。洋县人当初为呵护朱鹮而禁止狩猎、砍伐、使用农药的矛盾心情，消散在发展有机农业带来的切实回报中。截至2021年底，洋县累计认证有机农产品达15大类85种，并力推“朱鹮有机产品”品牌，其品牌潜在价值超过93亿元。

从7只到9000只，朱鹮再度飞舞，幸免于全族之殇，新一代的朱鹮保护者也有了新的梦想：他们将持续保护朱鹮野生种群，推进朱鹮野化放归，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增进国际交流合作，为让更多朱鹮重现历史分布地继续努力。

右图：两只朱鹮在陕西省洋县谢村镇一片收割后的稻田里嬉戏。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羌塘深处，守护藏羚羊

本报记者 徐驭尧

初冬，羌塘草原寒风如刀，寒意逼人。这是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改则县，境内有10多万平方公里的羌塘草原，十余万只藏羚羊栖息于此。

对改则县林草局局长仁增罗布来说，这些天地精灵是他守护的对象。远远望去，一群黑黄色的斑点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走近一看，原来是数百头藏羚羊密集地聚在一片草原上。

“这两年，我们的藏羚羊种群数量恢复得很好。”看着这些动物，仁增罗布满是欣慰，“去年冬天，我们这里遭了雪灾，当时咱还让这些藏羚羊当了一回‘外卖员’嘞。”

那是深冬里的一次常规巡护，仁增罗布发现大量藏羚羊集聚。“这是怎么回事？”仁增罗布立马询问负责这一片区的管护员。

现场没人弄得清楚。之后几天，仁增罗布多次打电话向管护员询问情况，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因为大雪，这些藏羚羊聚集到积雪较浅的草场上，就为了有了一口食物。

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天气，草场厚厚的积雪没有消退的意思，藏羚羊们的生存受到巨大威胁。

“这样下去不行！”仁增罗布暗下决心，他决定做一件之前没人做过的事儿，“为藏羚羊们送‘外卖’。”

粮草由何而来？他带着县林草局的工作人员找到一家有存货的合作社去收购剩余的干草，大家听说他是收来去喂藏羚羊，都给林草局的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外卖”怎么运达？仁增罗布和局里的工作人员把这些干草一捆捆地装上大货车和小皮卡，经过一整天的运输送到藏羚羊栖息地附近的管理站。刚开始，管护员和林草局工作人员只投放了一半的干草到草地上。“咱们也是第一次干，谁知道这些藏羚羊是否‘领情’？”仁增罗布笑着说。

第二天一大早，他心情紧张而忐忑：一到草地，他立刻跳下车，就去



看各处摆放干草的剩余情况。看到各处的干草都被啃食了不少，仁增罗布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跳下车时，仁增罗布因为过于匆忙，忘了戴手套，他的眉毛上都结满白色冰霜，双手冻得发僵。虽然天气冻透了身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无比高兴——“咱这土办法，还挺管用！”

改则县林草局工作人员把草料送到管护站，管理员们再把这些草料送到藏羚羊栖息地较多的地方。半个月下来，改则县的工作人员撤出去十几吨的草料，帮助藏羚羊度过了冬天。在改则县，23个管护站，200多名管护员，看着10多万平方公里的草场，他们对于辖区的草木生灵，万水千山都很熟悉。哪里常栖息着什么动物，他们多是心中有数。

一周时间跑上一两千公里，“各地管护站转转，看看有没有需要我们的情况。”仁增罗布刚刚结束了又一段长期的巡护，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

管护员群觉2017年成为保护员。作为土生土长的改则人，他从小就和这块草原打交道。夏天，群觉和同伴们骑着摩托车，揣着本子和望远镜，在羌塘一逛就是一整天。“这里海拔高，哪怕是四五月也时常下雪，七八级的大风更是家常便饭。”群觉说。

“羌塘如此广阔，仅仅依靠县里的管护员远远不够，需要每个老百姓都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仁增罗布说。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达29.8万平方公里，无数像仁增罗布和群觉一样的保护者坚守一线，守护藏羚羊生存的空间。

正是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藏羚羊种群数量逐步恢复，藏羚羊种群数由上世纪最低谷时的7万只，恢复到现在的超30万只。

上图：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在草原上奔跑。
新华社记者 周荻满摄